

Social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新市场
社会主义

[英]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著
姜辉 译



东方出版社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新市场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英]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著 姜辉 译

東方出版社

Copyright © Christopher Pierson 1995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First published in 1995 b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UK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UK

据英国剑桥政策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中文版经作者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186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英)皮尔森(Pierson, C.)著;姜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2

书名原文: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ISBN 7-5060-1310-X

I . 新…

II . ①皮… ②姜…

III . 社会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IV .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861 号

新市场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XIN SHICHANG SHEHUI ZHUYI

DUI SHEHUI ZHUYI MINGYUN HE QIANTU DE TANSUO

[英]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著 姜 辉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46 千字 印数:1 - 5,000 册

ISBN 7-5060-1310-X/D·135 定价:18.00 元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约翰·皮尔森

1921—1994

旅行者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并且迷了路。他们偶然遇到一位看上去很聪慧的当地人，于是就请求他指点路径，以回到通向目的地的正确道路上去。“啊，”这位当地人思忖了一会儿后答道，“如果那里真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我是不会从这里出发的。”

——无名氏

当你排除了不可能的东西时，不管剩下的东西如何不大可能，它们必然就是真理。

——亚瑟·柯南·道尔《四签名》

中译本序

姜辉博士翻译的《新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理论界的又一喜事。该书对于从多视角了解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模式无疑大有帮助，对于反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肯定也是不无启益。姜辉博士参加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管理项目”“市场社会主义研究”和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研究”，我们课题组对这一领域涉猎已有多年，有了初步了解，这本译著正是作为其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奉献给读者的，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市场社会主义”话题。

(一)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它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这种探索是在与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辩论中引发的。

当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就开始责难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有效进行经济运行，认为马克思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危机，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运

行作具体设计,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计算,如何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等问题。19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汉姆·H.戈森就臆断社会主义国家中央经济当局很难合理组织经济活动。此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时断言,社会主义消灭财产私有制将同时消灭合理的经济计算与资源的最优配置。法国经济学家阿·谢费尔、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等都曾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格如果不考虑使用价值的情况而单纯以劳动成本来估计,就不可能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就不能正确估价生产要素,因而不能正确指导生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否定性论调在20世纪初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荷兰经济学家皮尔逊在其190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一文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市场、没有交换,从而无法衡量产品价值,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种论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进一步加以发挥,后者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攻击社会主义没有货币价格,没有经济计算,一切都将在黑夜中摸索,因此,“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破产”。1935年,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头面人物哈耶克把皮尔逊、米塞斯等人的文章翻译编辑成册,连同自己的《问题的性质和历史》一起,汇集出版了英文版《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成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立的宣言书。

在这期间,与上述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也在探索中发展和成熟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如瓦尔拉、维塞尔、帕累托等在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的探索上,有意无意地对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贡献。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首创者,他在论文集《应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进

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组织和维持自由经济竞争，建立完全竞争机制，从而使一般均衡价格得以实现。维塞尔在其《自然价值》中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也需要经济计算，存在“估算价值理论”，必须运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衡量标准和本质上一致的计算原理。帕累托则在《社会主义》等著作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创造并实现“最优福利状态”的条件，达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比自由主义经济更容易实现最优化产出量，更为有效。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学家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是在探讨“经济行为的一般逻辑”时自动带来的副产品，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一样受到他们所揭示的同样的经济规律的约束。然而，他们的学说却为此后的论战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1908年，帕累托的弟子巴罗内发表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发展了帕累托的上述思想，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并初步提出运用“试错法”，求解均衡方程式，达到计算价格与最低生产成本相等，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20年后，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泰勒针对米塞斯等人文章引发的辩论，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了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为题的会长演说，进一步发展了巴罗内的试错法思想，提出采用“反复试验法”的计划形式来决定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五个步骤。此外，英国学者迪金生也发表文章批驳米塞斯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可以运用理论经济学说明竞争机制形成价格，引导生产方向。

这样，当哈耶克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立的文集出版以

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一方就有足够的思想资料去建构一种系统清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作为对否定派的反驳。这个任务是由当时侨居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完成的。兰格在1936—193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一时期理论争论中社会主义肯定派一方观点的集大成者。兰格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央计划局通过模拟竞争市场机能,采用分散决定的方法,即依靠市场竞争中供求的均衡作用来调整价格和产量的方法,进行资源配置的系统设想,形成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诞生。

(二)

当人们谈论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在众多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布鲁斯的定义应该算是最具权威的。然而仔细考察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产生的各类模式,却发现这种定义并不符合具体实际。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依其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1)上面所说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2)60—70年代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

“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模式有：布鲁斯“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3)80年代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4)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左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在这四个阶段中，以“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二阶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期”。我们这种“两时期四阶段”划分法不仅充分考虑到不同阶段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特征，注意到这些模式所描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式、中央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等方面存在的实质性差异，而且把市场社会主义与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落跌荡的历史联系起来，尤其是，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划分中还可以领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运行、改革的历程，以及在整个国际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制度冲撞与整合的情景，因为市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潮，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思潮。

很明显，前期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无论是兰格模式，还是布鲁斯模式或锡克模式，甚至后来的科尔奈模式，都是在传统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的框架内运用市场，使计划模拟市场或市场与计划并存。而近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到其基本特征，均与前期形态有很大不同。在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80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机制在“实验”中未能很好协调。此外，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其发

挥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90年代重构各种新模式时，不仅苏东剧变之后中央计划经济被彻底抛弃，而且有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与这种背景相一致，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强调只在市场无法奏效的地方才运用政府干预，在所有制问题上也很少有人主张国有经济，而是采用劳动合作组织形式“雇用资本”，突出分配平等要求，或福利共享。这类市场社会主义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因此，布鲁斯在定义中使用笼统的“公有制”与“市场”概念，显然无法具体、准确地界定不同时期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以60年代东欧改革为主的前期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探索革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替代模式，寻找传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运用市场配置资源争取效率的有机结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就其社会主义性质而言是：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为基础，运用市场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经济民主、分配平等、选择自由、消除剥削等等。

(三)

9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掀起新一轮的市场社会主义辩论热潮，而且无论是从参与的人数看还是从建构新模式的数量看都属盛况空前，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这是苏东剧变之后，左翼理论家在反思苏联模式，重构社会主义未来前景时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有论者甚至断言，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方向。英国学者皮尔森的《新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产生的、值得一读的新作。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1986），《超越福利国家？》（1991）和这部《新市场社会主义》（1995）以及一系列理论文章。

《新市场社会主义》全书分三部分共八章以及导言和结论。第一部分从讨论苏东剧变后聒噪一时的“社会主义死亡”论开始。工人阶级的队伍缩小了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淡化了吗？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衰退了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危机？作者运用新颖广泛的资料认真分析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深入考察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境况和面临的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尽管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在许多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但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能真正证明“社会主义死亡”论的正确性；使资本主义不具吸引力不具合理性的那些基本问题始终存在；在迎接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的各种尝试中，最勇敢、理论上最连贯的尝试是目前西方出现的新型市场社会主义。这就把话题转到新市场社会主义中。

第二部分仅有一章的篇幅，讨论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大致轮廓。皮尔森这样概括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社会主义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包括社会所有制、企业家问题、企业结构与管理、收入分配，以及国家的作用等方面。但是，新旧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对这些基本构成的认同是大有差异的，即使在新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中也是大不相同的。皮

尔森不像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那样根据自己认同的诸种构成要素的性质,去建构和倡导某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尽力揭示各个不同论者在同一构成要素中的不同主张,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市场?市场社会主义能否达到或达到怎么样的经济效率、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问题的描述中,皮尔森同样竭尽全力揭示其中的不同观点,甚至相互之间的矛盾。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更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也才更加值得一读。

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头戏,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可行性的评价。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由是市场产生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无效率以及它的反民主、反自由和反社会;右翼则大肆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歪曲和篡改了市场秩序,从而瓦解市场公正,剥夺成功者的财富,维护穷人的依附感,强化集团利益特权以及侵犯个人自由,等等。皮尔森还评述了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所有制”问题上的致命弱点,以及工人管理型(合作社企业)经济的适用性问题。关于民主和国家问题,皮尔森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扩大工人参与性民主、扼制私人资本权力和淡化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因此,“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政治理论,要比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理论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最后的第八章是讨论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它的政治支持)的问题。

(四)

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或者说,什么样的国家最有可能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约

翰·罗默在其阐述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中译本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分析了如下几种情况:(1)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如果能转向市场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仅机会成本最少,而且可以避免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许多不平等和动乱。(2)独裁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左翼政党掌权,社会具备沿着市场社会主义路线发展的民众意向等基础。(3)劳动阶级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可以凭借市场社会主义舞台赢得未来选举,向着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方向前进,或是改造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4)发达民主的资本主义要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是最不可能的。

在《新市场社会主义》中,皮尔森在分析像英国这样的“福利国家”的情况后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不能作为左翼重新确定战略的基础。这种结论与罗默分析的第四种情况是一致的。当然,市场社会主义不适合于这类国家,并不等于它在其他诸多环境没有前景。况且,各种经济社会制度,包括市场社会主义,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国家的形势和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在今天不会选择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没准明天遇上什么危机,又会想起市场社会主义来。而像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这样从多种视角来评论市场社会主义,甚至多少带有否定性结论的著作,对于推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无疑也会很有帮助。

目前,中国正在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经济运行机制特点、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而不是依赖所谓的“理性选择”基本假设、提供社会政治制度保障等方面,与国外市

场社会主义有着重大区别。然而无庸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模式及其“实验”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料和经验教训。如果进一步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广泛的含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若深入地研究国外市场社会主义，读一读像《新市场社会主义》这类思路和视野开阔的评论著作，相信不会没有收获。

因此，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认为，无论要从多视角了解市场社会主义，还是想深入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皮尔森的《新市场社会主义》都是值得一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余文烈

1999 年中秋

作者中译本序

当人类的第三个千禧年到来之际，资本主义看来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胜利。而似乎作为插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干脆将其大约划在 1789 年和 1989 年这 200 年之间，看来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尽头。共产主义，这种曾经主宰了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制度，现在也是力量耗尽。这种判断很容易找到自己的理由，而证明这种判断的变化也确实比比皆是。但是不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反驳说，这样的描述是一幅非常片面、视觉单一的图画。从斯德哥尔摩或从索韦托（南非东北部城镇。——译者注）或从上海等地分别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看来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而且，资本主义不仅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且它在不同政治体制下对市场结果的制约形式和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将社会主义等同于集权计划，人们从目前的组织变化情况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区分很有诱惑力，且初看起来也令人信服，但我们认为这种区分难以成立。尽管社会主义的定义并不明晰，但很显然，人们不能把它等同于一种特殊形式的集权经济组织。资本主义也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市场统治。的确，虽然市场和准市场越来越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它们决不会成为惟一的配置资源形式，它们仍像以往那样被广泛积极地调整。卡尔·伯兰尼（Karl Polanyi）作出的如下论断是颇有道理的：谁创造了市场，谁也同

时创造了试图取消市场后果的力量。

上述这些评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也不是想掩盖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令人遗憾的记录(尽管任何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较为完整的分析都需要实际的限定性条件)。但不论如何,这决不是任何历史的终结,尽管我们面对着一种极为自信的反对意见。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些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由于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交互作用,已被改头换面了。而那种关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已完全“屈膝”于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也不能真正令人信服。的确,依许多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新自由主义现在看起来不像是一种占尽优势的正统,而像是对那种早期原始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所抱有的错误信仰进行的临时“调整”。与此同时,在现实的全球经济范围内,对于每一位新冒险家式的资本家来说,看来至少存在着两种新的调节手段。

中国在新型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近些年来它的经济快速增长,也由于其幅员辽阔,或许在 21 世纪它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相结合的模式——将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不可能采取本书所概括和讨论的那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也不希望它成为美国模式的最新翻版。但我们应该希望:在探索符合 21 世纪新生活形式要求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新形式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1999 年 5 月,于英国诺丁汉大学